



冷战期间美国华人左翼青年团体的变迁^①

何 慧

摘 要: 20 世纪 50 年代,“麦卡锡主义”肆虐,反共气氛笼罩美国,包括华人左翼青年团体在内的美国进步势力在受到打击和迫害之下逐渐沉寂。60 年代,民权运动催生了亚裔美国人运动,新一代的华人左翼青年组织也应运而生,他们虽然有点偏激,但在服务华人下层、反对越南战争、呼吁改善中美关系方面,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冷战期间美国华人左翼群体的变化折射出冷战时期美国的政治生态。

关键词: 美国华人; 冷战; 左翼; 青年团体

20 世纪中期以前,华人尽管在美国社会中总的来说是处于“无政治意义的、非公民的苦力”状态^②,但仍积极地投入了政治活动,包括争取废除排华法、罢工以及支持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并在后两种运动中出现了认同马克思主义,接受或同情社会主义思想的左翼力量,其中最突出的是成立于 1933 年的“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Chinese Hand Laundry Alliance, CHLA)^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华人左翼组织更加活跃,他们反对中国内战,反对美国支持国民党政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欢欣鼓舞,其中的代表是“三藩市华人民主青年团”(Chinese American Democratic Youth League of San Francisco, CADYL),简称“民青”。正当华人对未来充满希望、感到乐观之际,冷战爆发,美中敌对,美国国内出现反共产主义狂潮和反民主逆流,华人社会受到影响,左翼团体和人士首当其冲。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美国政府启动针对华人移民的“坦白项目”,在华人社会制造紧张气氛,并借此迫害和驱逐华人左翼人士,绝大部分华人左翼团体解散。60 年代,伴随黑人民权运动出现了亚裔美国人运动。受到中国及第三世界的革命运动影响,涌现出新一代的华人左翼青年团体,其中的典型是“义和拳”(I Wor Kuan, IWK),他们服务华人下层、争取华人权益、反对越南战争、呼吁改善中美关系,打上了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

美国史学界对于美国华人左翼团体的专门研究不多,著名华人史学者麦礼谦(Him Mark Lai)较早系统研究美国华人左派。他认为,美国出现华人左翼活动的原因,一是中国的民族革命,二是华人在美国受到压迫和歧视。邝治中(Peter Kwong)在梳理美国华人社会 150 年的发展历程时涉及到华人左翼团体的活动。林振华(William Wei)全面论述

①感谢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为本文作者提供作为访问学者的机会;感谢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亚裔美国人研究中心暨族裔图书馆为作者查找资料提供的帮助。

②Gordon H. Chang. *Asian Americans and Politics: Perspectives, Experiences, Prospects*. Washington, D. 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1, p. 46.

③关于该组织的最好著作是 Renqiu Yu. *To Save China, to Save Ourselves: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Hand Laundry Alliance of New York, 1930s-1950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了亚裔美国人运动,认为其中有“改革派”和“革命派”之分^①,但他们没有解答一些问题,如“坦白项目”与冷战有多大关系?华人左翼团体是受到外来激进势力影响还是美国社会历史的产物?该如何评价左翼青年团体的历史价值?本文拟在吸收美国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第一手的档案资料,以“民青”和“义和拳”为重点,梳理和分析冷战期间美国华人左翼青年团体的兴衰起伏,考察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及美国华人社会的变迁。

一、冷战初期美国的反共恐怖与“坦白项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美国华人为中国作为战胜国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而感到自豪,废除《排华法》后,华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有所提高,所以,他们对未来感到乐观。然而战后的国际国内形势急剧变化。国际上,美苏矛盾凸显,冷战拉开帷幕;在国内,罢工运动再起,杜鲁门政府予以镇压,一些政客把激进的工会分子与共产主义威胁联系起来,掀起了反共浪潮,1947年通过的《塔夫脱-哈特来法》剥夺了工人已获权利,同时,“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 HUAC)又开始对进步人士进行调查。

在出现反共逆流的情况下,华人左翼人士没有退缩。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的华人社区中出现了不少新的左翼报刊,如1949年5月4日在三藩市创办的《金门侨报》(*China Weekly*)与创办于1940年的《美洲华侨日报》(*China Daily News*)一起成为支持新中国的美国华人媒体。1949年10月9日晚,“美国华工合作社”在其成立十二周年纪念会上庆祝新中国成立时挂起五星红旗,对此,国民党雇了一帮人来捣乱,抢旗子、搞破坏,第二天又在华人社区发传单,公开反对左翼团体的活动,但《金门侨报》和《美洲华侨日报》继续发行,而“华侨争取中国和平民主同盟”(OCLPDC)成员中的部分商人买下的《中西日报》(*Chung Sai Yat Po*)也成了支持新中国的媒体。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11月底、12月初,三藩市、纽约和华盛顿的中华公所纷纷表态反共,1951年1月,三藩市“华侨反共总会”成立,成为美国华人中最活跃的反共势力,许多左翼组织受到排挤和打击,“为了不惹麻烦,大部分华人社区的组织都加入其中”,只有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拒不加入因而成为美国反共势力的眼中钉,但大多数华人不敢再与进步团体有瓜葛,华人社区的“保守派特别是国民党有了重获影响力的机会。”^②此时,美国政府不仅阻止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回国,而且联邦调查局开始进入华人社区,制造恐共、反共的气氛。如1952年美国政府指控《美洲华侨日报》刊登属于中国的香港南洋银行的广告并获取广告费,这一行为违反了《与敌国通商法》(*Trading with the Enemy Act*),这个法案是1917年通过的,但从未实际应用过。该报主编梅参天被判入狱两年,经上诉后改为一年。那些通过该银行向国内亲友汇款的华人也被指控和定罪。1954年8月2日,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对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总部的电话使用“技术监控”,试图找出该组织从事“亲共活动”及其与《美洲华侨日报》之间来往的证据,其会员也不断受到联邦调查局的滋扰而“生活在恐惧之中”。1957年8月12日,胡佛还指示下属“闯入”“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指望“找到有关激进政治活动的证据”^③。

美国在1943年废除了《排华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申请赴美的侨眷大增,美国各地移民局都有很多积案,广州和香港的领事馆也处理不及。1949年美国总领事馆撤出广州后,又把许多未办的

① Him Mark Lai, "A Historical Survey of Organizations of the Left Among the Chinese in America", *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News Letter*, Special Issue: Asian America, 1972, 4(3), pp. 10~18; Him Mark Lai, "The Chinese-Marxist Left,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in America and the New China, Mid-1940s to 1950s", *Chinese America: History & Perspectives*, 1995, pp. 7~25; Him Mark Lai, *Chinese American Transnational Politic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0; Peter Kwong, *Chinatown, New York: Labor and Politics, 1930-1950*.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1, p. 49, 该书首次出版于1979年,2001年再版时作者增加了新的导言和跋; Peter Kwong, Dušanka Mišćević, *Chinese America: The Untold Story of America's Oldest New Community*.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5; William Wei, *The Asian American Movemen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② Peter Kwong, Dušanka Mišćević, *Chinese America: The Untold Story of America's Oldest New Community*.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5, pp. 222~223.

③ Renjiu Yu, *To Save China, to Save Ourselves: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Hand Laundry Alliance of New York, 1930s-1950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91; Athan G. Theoharis, John Stuart Cox, *The Boss: J. Edgar Hoover and the Great American Inquisitio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4, p. 441, note 53.

案子交给香港的领事馆,使之更加应接不暇。而在香港等候办理赴美手续的有些美籍华人子女眼看就要超过规定的16岁年龄限制,“急于去美,而行期渺茫”,心急如焚,这时有人趁机说有门路可以加急代办,于是“茶楼酒馆一时成为侨属来美的‘斟盘’场合”,承办侨眷出国手续的机构“竟如雨后天春笋,随处皆是,遂成热门生意”。有些美国的移民律师也到香港直接把人带到美国“再打长期官司”,所以那个时候“贿赂舞弊在美国各地与香港都已成公开秘密”,不少侨眷受骗。美国国务院获悉这些情况后,派人调查香港总领事馆的贪污,并查办了主管签证的副领事等人,与此同时,“冒籍”的问题也被揭发出来^①。

20世纪上半期,在严厉的《排华法》之下,华人进入美国非常困难,即使是废除了“排华法”,每年也只有105个移民限额,想循正当途径移民美国近乎登天。另一方面,1906年三藩市发生大火,烧毁了美国移民局存档的华人的出生证明,而中国官方也没有统一的结婚证、出生证,所以美籍华人家属申请赴美的手续主要是签宣誓书,并有两个以上的证人证明。于是,就有回国的美籍华人在重返美国的时候向移民当局报告说自己在华生了儿子,便可获得一个入境证书。一些想移民美国的人于是通过购买这种证书冒充已经入籍的美国华人的子、孙而进入美国,史称“证书儿子”,俗称“买纸仔”(paper son)。这其实是“排华法”的副产品^②。

当时获得国务院授权签证的香港总领事馆对“申请来美签证之华人作威作福,吹毛求疵,察察为明,苛求之酷,史无前例。”^③华人赴美办理签证要过五道难关,包括填写“内容繁琐而不合理,纯是特设的陷阱”的表格;验血;签“宣誓书”保证所说并无虚言,而在反复聆讯中一旦出错就被说成作假、伪誓;要证明自己不是“附共分子”^④。所有这些程序只针对华人,没有其它哪个国家的移民需要满足这些要求。

1955年,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杜林礼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一份长达89页的报告,认为有许多不符合移民条件的中国人,甚至“中共间谍或其他刑事犯进入美国”,所以需要“一切作弊问题”进行“辨认”^⑤。1956年2月,三藩市和纽约的大陪审团向各华人宗亲会、同乡会发出传票,要他们在24小时内携带所有文件资料到联邦法庭接受聆讯,因为他们相信参加这些团体的华人用的是自己的真实姓名,只要以此为据核对一下他们的身份姓名就可以找出冒籍人士。这一举动在华人社会引起“震惊”,“就像在唐人街扔下了一颗原子弹”^⑥。“坦白项目”一是希望一劳永逸地消除非法移民,二是将美国社会中的“政治异端”连根拔起^⑦,然而这种指控可能导致已经在美国的成千上万华人被拘捕,也无助于解决长期的积案。最后,美国司法部和华人社会人士商议,同意凡是主动承认冒籍的人可能获得调整为正式的合法身份,不过,他们首先要签署文件,确认如果其坦白被否决的话愿意接受驱逐因而具有很大风险;而如果不坦白被人揭发出来,被驱逐的可能性则更大。该项目1965年才终止,承认冒籍或被揭发出的冒籍华人多达3万多,而当时的美国华人总共才11万多人,可见波及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在这样急剧变化及恶劣的形势下,左翼团体的命运可想而知,三藩市“华人民主青年团”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二、三藩市“华侨民主青年团”的命运

1940年的七、八月间,在三藩市出现了一个只有三四十人的“新文字研究会”,其主要目的是“团结青年研究学术,交换知识,学习新文字,推行新文字,扫除文盲”。1941年8月,他们参加了要求美国政府禁止向日本运输废铁的群众抗议活动,并提出“每一个青年及侨胞都(应该)起来团结御侮,共赴国难”,“拯救祖

①朱夏:《美国华侨概史》,中国时报社1975年,第144页。

②关于《排华法》的执行情况及造成的“证书家庭”现象,参见Estelle T. Lau, *Paper Families: Identity, Immigration Administration, and Chinese Exclusi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一个“证书儿子”的亲身经历,见Tung Pok Chin & Winifred C. Chin, *Paper Son: One Man's Stor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③刘伯骥:《美国华侨史续编》,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第123页。

④填表的详细情况见李大明:《驻港美总领事报告书批判》附录2,世界日报社1956年;刘伯骥:《美国华侨史续编》,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第123页。

⑤其报告的中文译本见李大明:《驻港美总领事报告书批判》附录1,载《世界日报》1956年。

⑥刘伯骥:《美国华侨史续编》,第124页。

⑦Estelle T. Lau, *Paper Families: Identity, Immigration Administration, and Chinese Exclusi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16~117; Judy Yung & Ruthanne Lum McCunn, Russell C. Leong (eds.), *Him Mark Lai: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American Historian*, Los Angeles: UCLA Asian American Studies Center, 2011, p. 94.

国,拯救全世界和人类”。1942年,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扩大,他们与其他几个青年团体联合成立了“加省华侨青年救国团”,出版《战斗》刊物和《青救团报》,募款购买礼物慰问华裔军人等,其成员还积极参加军工生产并有35位成员加入了海陆空军并有人牺牲^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加省华侨青年救国团”认为“帝国主义……将枪口转向了殖民地的人民,同时,殖民地的人民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劳苦大众却在艰苦的斗争中加强了团结,提高了战斗力”,于是提出要“为人类的自由解放而继续奋斗”。1946年初,“为着适应目前情势,为着展开未来的工作,为着争取祖国民主政治”,加省“华侨青年救国团”改名为三藩市“华侨民主青年团”,制订了新的章程,提出其宗旨是“团结华侨青年,共同研究学术,充实生活内容,争取青年利益,为民主工作奋斗”,还要“为建立自由和平民主统一独立的新中国而奋斗,为着世界的弱小民族获得真正的自由解放”。他们在1946年筹款捐助中国难童并委托美国援华会把捐款转交给宋庆龄,1947年响应陶行知基金的募捐活动,组织各种专题联谊会,内容包括“中国内战的过去和未来”、“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等^②。

新中国成立后,“民青”的一个主要活动是介绍新中国的文化,如成立歌咏队,学习和演唱中国的流行民歌,还在其刊物上欢呼新中国的成立是“打下了中国人民独立自由民主的基础,带来了中国人民翻天覆地的改变”,表示要“团结起来将我们所有力量贡献给伟大的祖国”。它抨击国民党军队在1950年2月23、24日轰炸广东的江门、台山造成大量死伤的“惨绝人寰的兽行”,呼吁“稍有家乡观念、稍有正义的人”联合起来抗议,“向蒋府清算血债,拥护人民政府解放台湾,把蒋介石彻底消灭,使我们的祖国能和平地从事建设,成为一个和平、民主、自由、幸福、富强的新中国”^③。

1951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民青”不仅关注到朝鲜战争的进程,也感受到了国内的威胁。他们看到美国最高法院维持对美国共产党十一位成员判刑,认为“这个宣判将威胁到每个美国人民的民主权利,它与我们华侨的生活前途是息息相关的,它说明了一个快要到来的政治大风暴”^④。“民青”果然受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长期严密监视,其一份报告指出:“在过去的几年里有超过1500名13—19岁的华人青年从香港进入美国”,“民青”是“这些年轻人的极为活跃的组织”,是“华侨社会最为突出的青年组织”。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人员把“民青”的章程以及《民青》和《民青团报》的所有文章都翻译成英文,在三藩市分局备存并向总部提交分析报告。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人员认为“民青”刊物上的文章,包括它转载的《美洲华侨日报》上的文章有“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反映出其持续支持中国政府和苏俄”的态度^⑤。

尽管美国联邦调查局没有找到足够证据对“民青”进行起诉,但“民青”为了避免惹出更多麻烦,在最为困难的1956年前后调整了策略,在其刊物上减少了政治方面的文章,以“优良的青年文娱团体”来吸引华侨青年,他们设立了理论学习小组、科学小组、进行写作训练,帮助新移民学技术,适应新生活以及开展话剧、歌咏、球类等文娱活动,在夹缝中生存并“成为唐人街最活跃的独立的左翼团体”^⑥。

“民青”虽然尽量减少了政治的活动,但由于“民青”的成员中有些人是《排华法》废除以前到美国的,没有正式的合法身份,又是左翼活跃分子,所以在“坦白项目”当中就成了重要对象而受到调查、盘问。“民青”成员大都上过法庭,超过半数人因为本人或父辈是“冒籍”人士而被处罚。由于整个大环境的影响,“民青”最终被迫于1959年解散,其部分成员另行建立了“海燕俱乐部”,但已达不到过去的辉煌了。即使“民青”解散,其成员所受到的影响也没有立即消除。从“民青”的事例可以看出,在20世纪50年代的反共恐

①《三藩市华侨民主青年团三周年游艺会会场特刊》,1945年12月29日;《民青团报》新一期,1949年12月1日;《民青团报》元旦专号,1949年12月31日;《民青十一周年纪念》特刊,1950年12月9日;《三藩市华侨民主青年团第十四届各部门工作经验总结》,1951年冬,Chinese American Democratic Youth League Miscellany,1940—1966,1:3-9,AAS ARC 2000/81,Asian American Studies Archives, Ethnic Studies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以下简称为AAS Archives)。

②《战斗》第3卷第4期,1946年5月;《三藩市华侨民主青年团章程》修改草案,1:1,1:4,AAS ARC 2000/81,AAS Archives。

③冯品:《伟大的十月一日》,载《民青》第23期,1950年9月26日;《民青团报》新八期,1950年3月11日;《民青团报》新九期,1950年3月25日,1:9-10,AAS ARC 2000/81,AAS Archives。

④《民青》第41期,1951年6月16日,1:9,AAS ARC 2000/81,AAS Archives。

⑤SAC SF to Director, FBI Files, 2:1,AAS ARC 2000/81,AAS Archives; SAC LA to Director, 9/13/1956, 9/14/1956, 9/28/1956, FBI Files on The HCUAA, microfilm, Doe Library, UC Berkeley。

⑥Him Mark Lai, “A Historical Survey of Organizations of the Left Among the Chinese in America”, 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News Letter, Special Issue, Asian America, 1972, 4(3), p. 16; Peter Kwong, Dušanka Mišević, Chinese America: The Untold Story of America's Oldest New Community,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5, pp. 225。

怖气氛中,美国的左翼团体受到极大打击,而且美国政府用驱逐来恐吓左翼人士的做法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①,所以大部分华人只能选择沉默,华人社区只有国民党支持的保守派一家之言。在这样的恐怖阴冷气氛中,左翼青年组织近乎灰飞烟灭,华人青年不再有健康和丰富多彩的活动,华人社区变得死气沉沉。这样的情况会一直持续下去吗?

三、民权运动、亚美人运动与“义和拳”

在20世纪50年代的反共气氛下,华人社区的左翼力量沉寂,而传统的华人社会也出现变化,上大学的年轻人成为专业人才后离开了唐人街,慢慢融入主流社会,有的华人到美国读大学后留在美国并成为中产阶级。60年代初,唐人街出现分化,传统的商人精英忽视青年工作,土生的华人青年与老一辈形成代沟,唐人街几乎成了贫民区,破破烂烂,冷冷清清。1965年的移民法通过后,大量来自港台和东南亚的华人新移民来到美国,其中有不少是毫无技能、无所事事、不能融入主流的青少年,于是暴力破坏、帮派斗殴常常出现,说明唐人街的社区建设和社会服务完全满足不了实际需要,其中以三藩市和纽约最为典型,新的华人左翼青年组织也最早在这两个城市产生。

20世纪60年代末,伴随着黑人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亚裔美国人的“种族意识觉醒”,他们视越南战争为美国反对亚洲人的种族主义战争,从而为“争取种族平等、社会正义和政治赋权”团结起来,建立了“亚裔美国人政治联盟”(Asian American Political Alliance, AAPA)等各种组织^②。对华人激进青年来说,黑人组织“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和波多黎各人的“洛德党”(Young Lord)的影响最大。受“黑豹党”影响,三藩市的华人青年成立了50年代末以来的第一个左翼组织并接受“黑豹党”的十点纲领,取名为“红卫兵党”。他们在唐人街开设办事处,悬挂五星红旗,在大街上播放歌曲“东方红”,在开设的政治教育班上学习毛主席语录,放映借来的第三世界人民斗争的影片,介绍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等。同时向穷苦儿童提供免费早餐、午餐。他们组织租户反对房产主和开发商,还与前来搜查的警察发生了冲突,但之后其内部出现分歧,有一部分人认为除了“杀猪”(指杀警察)“别无他法了”,把重心转向“建立政治武力”、“准备武装”,从而脱离了美国的国情,难以得到大多数华人的支持和响应而于1971年解散^③。

1969年,由哥伦比亚、普林斯顿等几所大学的学生建立了“义和拳”,他们基本上是住在唐人街以外的第二代亚裔青年,出生中产阶级,入读名校,“自豪、聪明、有政治意识”。他们视中国为第三世界人民自力更生和坚定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压迫的象征。“义和拳”成立以后就开始在露天放映新中国的电影,每周两次,他们售卖中国的书籍、资料,展示五星红旗,庆祝中国国庆,在出版的《团结报》(Getting Gather)上引述毛主席语录。这些做法“打破了在华人社区公开表达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的禁忌”,“成功地冲破了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封锁”,因为自从麦卡锡时代以来,美国华人没人敢这样做。但唐人街的传统势力仍然很强大,国民党右派分子常常与他们对着干,如不准唐人街的报摊代售《团结报》,吓唬华人说凡是到访“义和拳”的人都会被联邦调查局拍照,以此恐吓人们,还在“义和拳”放映中国电影的时候从楼上倒出污水来骚扰^④。1971年4月,“义和拳”接替解散的“红卫兵党”在三藩市设立分部,同年10月16日,“义和拳”和其他“几百个爱国华侨、外国进步友好团体人士们”聚集在三藩市的圣玛丽公园开展“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益并驱逐蒋帮傀儡政权”的示威,“义和拳”的代表和《华声报》社长翁绍裘等人发表盛赞中国的演讲后,示威者高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等口号、挥动着“毛主席语录”游行到国民党驻美国总支部和“伪总领事馆”,高呼“蒋介石滚蛋”等口号,并“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连续十分钟之久,路人

①1971年11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在各地华人集中的街道墙面上贴出通告,黑色中文字体和红色电话号码及FBI字样煞是醒目,其中一条:“君等在美如有知悉共产党徒及毛派间谍从事情报、破坏及倾覆活动者,务请随时用电话通知当地FBI分局”,Richard Farrell, FBI Recruiting Information in Chinatown, November 2, 1971, H. Mark Lai Papers, 74:39, 2008/80, AAS Archives.

②参见 William Wei. *The Asian American Movemen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③“大埠‘红卫兵’政治史略(上、中、下)”,载《团结报》1973年2月17日,第6页,1973年3月3日,第7页,1973年3月17日,第8页, H. Mark Lai Papers, 74:43, 2008/80, AAS Archives.

④Peter Kwong. *The New Chinatown*.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6, p. 162;《华报周刊》1975年4月11日;Him Mark Lai. *Chinese American Transnational Politic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0, p. 37.

车辆为该惊人场面所吸引,纷纷驻足观看。”^①“义和拳”的此番举动颇显另类,但实际上反映出不少华人青年的看法,因为他们认为美国人不喜欢苏联却承认了它,不承认中国并不利于美国,“意识形态是一回事,承认(中国)是另一回事”,因为“不能假装几亿人不存在”^②。

随着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及尼克松访华,美国民众开始有了更多认识和了解中国的途径。“义和拳”于是把工作重点放在社区,他们提出“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为穷苦儿童提供免费餐食,在唐人街开设“赤脚医生”诊所,免费检查肺结核,开设日托中心,提供免费的课程,还提供兵役咨询和法律援助,解决租户的抱怨和工人福利等等。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本土的华人大约半数生活在三藩市、洛杉矶、纽约、芝加哥和檀香山这几个大城市的市中心,这个时期,除了檀香山,其他四个城市都出现了类似的青年左翼组织,除了以上两个团体,还有三藩市湾区的“为民社”、洛杉矶的“青年中心”、芝加哥的“新青年中心”和费城的“黄籽会”。他们在意识形态的激进程度上有差别,但在服务华人、关注弱势的社区福利方面的工作大致相同。50年代后期,“由于没有了‘华人青年团’的正面影响,唐人街的年轻人又耽于赌博、饮酒、色情”等活动,所以“义和拳”等左翼青年组织为华人社区提供的服务尽管十分有限,但带来了“新鲜空气”^③。60年代美国华人左翼青年组织不是20世纪上半期那种以工人为主的草根组织,其发起者主要是青年学生、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他们对中国和中国革命感兴趣,但不直接受到来自中国的共产党人的影响,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也并不了解,因而具有片面性,盲目性。他们的要求既有合理诉求、崇高追求,也有不合实际的幻想。1978年,“义和拳”与其他几个激进的左翼组织合并成立了“革命斗争联盟”,目标是继续推动世界革命,这显然脱离了当时的国际、国内现实,从而逐渐淡出了历史。

四、结 语

冷战时期的美国华人青年左翼组织的命运是美国历史发展的组成部分,并折射出政治潮流的变化。首先,美国华人政治地位的变迁是与美国的历史走势同步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华人主要聚居在唐人街,从事的是极少数服务性行业。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华人开始组织起来,并在各种政治活动中显示出力量,出现左翼组织。50年代,在冷战的大背景下,麦卡锡主义肆虐,反共反民主猖獗,美国的左翼和进步人士受到迫害,华人青年左翼组织也不能幸免。其次,美国的亚裔族群与其来源国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他们在美国的命运。冷战期间,美、日由战时对手变成同盟国家,而美、中则由盟友成了敌人,到70年代后,随着中美关系解冻、冷战缓和,美国华人的地位得到相应改变。第三,美国华人左翼青年组织体现的是美国从独立战争到乌托邦,从美国共产党到反战运动的激进传统^④,而且是具有“超越狭隘国界的新意识”^⑤。最后,冷战时期美国华人左翼青年组织的“政治路线”虽然对美国整个社会的影响不大,但是他们关注下层、关心社区的做法不仅在当时起到一定作用,而且得到延续,如今在华人社区有各式各样的公益组织,包括法律援助、医疗服务、双语教育等,许多都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青年社团或是由那些活动的参与者创办的。冷战时期美国的左翼青年团体尽管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打击,其成员甚至遭到驱逐、逮捕,但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和坚持自己观点的做法值得肯定。如今,冷战已经结束,意识形态之争不再突出,但是美国华人左翼青年团体所留下的关切他人、关爱下层、关心祖国和人类命运的行为永不过时。

●作者简介:何 慧,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香港大学历史系博士;广东 广州 510631。Email:hehui@scnu.edu.cn。

●责任编辑:桂 莉

①《团结报》1971年11月,H. Mark Lai Papers,74:40,2008/80,AAS Archives.

②“Growing Youth-age Split in SF Chinatown on Red China”, *San Francisco Examiner and Chronicle*, 1970-11-15.

③Peter Kwong, *The New Chinatown*, p. 163; Peter Kwong, *Chinatown, New York: Labor and Politics, 1930-1950*.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1, p. 147.

④参见 Timothy Patrick McCarthy, John McMillian, ed. *The Radical Reader: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adical Tradition*.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3.

⑤Sucheng Chan, *Asian Americans: An Interpretive History*.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91, p. 4, 100, 175.